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时代赋予的使命

□白 烨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都反复讲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样一个总目标,来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2017年7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培训班上的重要讲话》(以下简称“7·26”重要讲话)中,更是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摆在重中之重中的地位,强调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确保党和国家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胜利前进。”这次重要讲话还就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史变革与基本经验,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和行动方略,提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判断和重大举措。这对包括文艺文化在内的各行各业,在政治方向与思想导向上,在工作依循与事业仪轨上,都有重要的指引作用与领航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谈到党的十八大以来5年的决策重点与工作重心时概要地指出:“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推出一系列重大战略举措,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进一系列重要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从文艺文化领域来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就以一系列重要的部署和重大的举措,从事业的发展到创作的导向,从艺术的创新到精神的蕴含,从批评的振兴到体制的转变,都以顶层设计和重点布局等方式,出台了《中共中央关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意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就文艺与文化领域的工作提出了系统性的指导意见。尤其是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2016年11月出席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并发表重要讲话,饱含着对于文艺事业发展的深邃思考,饱含着对于文艺工作者的殷切期望,以一系列富有创见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争取社会主义文艺的更大繁荣提供了思想指针,为构筑时代的文艺高峰提出了行动纲领。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党中央就文艺工作连续做出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就文艺问题接连发表重要讲话,这在我国当代文艺发展史上还前所未有。这充分体

目前的文艺领域与文化现状,虽然不无丰繁,也趋于多样,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却一直是难以改变的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繁而不荣,多而不精。要改变这种状况,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下很大功夫,花很大气力。应该说,这不只是文艺的领导与管理部门的事情,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共同面对和一起应对的,甚至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

现了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艺的地位与作用的高度估价与空前重视,对于文艺家以文艺的方式建功立业的殷切期待。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重要讲话,全面论述了文艺事业应予坚持的方向,文艺创作应予持守的导向,文艺工作应予努力的路向,使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受教益,倍感鼓舞,至为振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认真学习两个重要讲话,深入理解其精神要义的同时,以全新的姿态和充沛的热情,积极地深入生活,努力地投入创作,积极地服务人民,使文艺的各类题材与体裁的创作空前丰繁,文艺的理论批评也重现活力和日渐活跃。跟过去相比,近5年以来的文艺创作,在切近时代生活的同时更加多姿多彩,文艺领域的态势,在板块之间的互动发展中更有新的面貌。

习近平总书记在“7·26”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现在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关键时期”;强调“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当前世情国情党情”。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取得的重大成就,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独特道路、宝贵经验与重大意义的总结和阐发,以其对历史与现状、理论与实践的独到把握和深邃思考,给人们深刻认识和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的武器,自信的依据,也以其看取事物的大局观,阐发问题的辩证观,给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动力与思想引力。

我们有幸置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作为这一伟大事业的参与者与见证者,一个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是面对现状,把握当下,面对未来,以高质量又多样化的文艺创作,以高水准又有影响的理论批评,高效能又有活力的体制机制,通过不同板块的创新发展与良性互动,在整体上构建一个以生活为依托,以人民为中心,以时代为基调的文艺生活体系,并以此为基础去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并在这一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全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紧紧依靠

广大文艺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引领,以中国精神为灵魂,以中国梦为时代主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创新为动力,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深入实践、深入生活、深入群众,推出更多无愧于民族、无愧于时代的文艺精品,不断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我们正处于“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的新历史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当然要以这个伟大的人类事业为底色,打上蓬勃的社会生活的鲜明印记,富含这个伟大时代特有的精神气概,蕴含我们民族远大的理想目标;它应该以讲述当下中国的精彩故事为己任,以传扬当今中国的时代精神为特色,使这个文艺区别于别的时代的文艺,并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一样,也以自己卓尔不群的艺术气象和唯我独有的精神气韵,毫不逊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文学之林。

与这样的高远目标、宏大任务相比,我们需要弥补的不足不少,需要补强的短板很多,需要开拓的空间很大。目前的文艺领域与文化现状,虽然不无丰繁,也趋于多样,但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却一直是难以改变的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繁而不荣,多而不精。要改变这种状况,解决这些问题,还需要下很大功夫,花很大气力。应该说,这不只是文艺的领导与管理部门的事情,而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共同面对和一起应对的,甚至是社会的方方面面需要通力协作的系统工程。当前的文艺工作虽然面临的问题很多,遇到的挑战很大,但正像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讲的那样:“实践充分证明,广大文艺工作者心怀祖国人民,响应时代召唤、追求艺术理想,是一支有智慧有才情、敢担当敢创新、可信赖可依靠的队伍。”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重要讲话的思想指引和全国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的精神鼓舞下,文艺工作者有信心也有能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and 文艺文化领域的各项工作,为构筑时代的文艺高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奉献自己的才情与心力,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文艺批评与文化认同之建构

□林雅华

很长时间以来,文学研究、文艺批评更关注文本的肌理分析,更加强调一种内在视角的研究。这种研究方式可以把文本分析做得非常精致漂亮,但是却缺乏一种现实针对性,尤其是缺乏一种将学术问题与社会问题、历史问题以及政治问题结合起来的研究思路。那么,在当下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应该如何定位文艺批评?是将其囿定在一个学科或者学术话语之中,还是应当拓展其研究思路?一个可能的路径是,我们可以尝试摆脱学科内在视角的束缚,从现代性反思批判的外在视角出发,探寻一种具有现代意识的文艺批评话语——将文艺批评视为一种现代社会的“认同话语”。

具体而言,这种批评范式将突破文艺批评的内在视野,重新将其与社会话语、历史话语、政治话语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政治性、历史性、社会性的角度来重新看待文艺批评。换言之,文艺批评的功能并不局限于文学文本本身,而是有着更为深厚的社会建构与文化认同之内涵。它并不只是一种单纯的学术话语,而更是一种建构话语、认同话语。当代中国所经历的一系列激烈的社会历史转型,使得我们在各个不同的层面都需要价值观的重建、文化认同的重新树立。文艺批评所固有的文化建构功能在这样一个历史过程中,必须重新得以倡扬。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创作,不仅需要承担自身的学科功能,同时也需要承担更为广阔的社会功能、历史功能,进而从价值观的角度不断凝聚社会共识、增强民族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

所谓“认同话语”,指的是个人或者民族对于他们的个体存在,及其作为共同体存在的本质理解。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套现代性话语。也就是到了现代之后——当人类脱离了原始部落、封建宗族,尤其是在西方,脱离了上帝的怀抱,进入现代性荒原之后——人们变成了没有关联的个体,开始重新寻找归属和认同。如此,认同才成了问题。近年来,随着民族国家界限的不断突破,后民族国际政治格局的不断出现,认同问题,或者说承认政治的问题逐渐成为了一个国际性的话题。其理论源头是黑格尔耶拿时期的思想,后来在法兰克福学派的哈贝马斯,尤其是在霍耐特那里发展出了一整套的承认理论。霍耐特的重要作品《为承认而斗争》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们所关注的焦点在于,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如何才能结成共同体,而在共同体中人们之间又如何才能实现彼此的承认与认同。毫无疑问,现代社会的认同,需要借靠一些东西,但绝不是僵硬的政治或者流动性的资本,而是文化,是内在的价值归属与价值纽带。因此,文学艺术,或者说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社会科学所产生的凝聚作用、认同作用、承认作用在当下才变得如此重要。

在这个问题上,哈贝马斯通过对德国人文科学学术话语的深入思考,为我们重新认识文艺的认同作用及其建构意义提供了启发。《后民族结构》是哈贝马斯探讨现代性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国际政治的一本论文集。其中收录了一篇题为《何谓民族》的论文。在这篇论文中,哈贝马斯详细考察了1846年在法兰克福召开的一次日耳曼语言文学学大会。他之所以对这次会议如此感兴趣,是因为他想以此作为契机,深入探讨德国人文科学学术价值与政治自我理解。按照哈贝马斯的设计,这个日耳曼语言文学学大会的召开,应当完成双重历史使命。第一重使命是学术意义上的,也就是通过专业语言文学家的研究与探索,逐步完成德国人文学术研究的专业化与制度化;第二重使命是政治意义上的,也就是通过这一批社会学精英的聚集和讨论,为结束德国四分五裂的状态,促进德国的统一与富强,提供一套思想文化方案。这双重使命的达成势必能够为德意志民族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奠定坚实的学术与思想根基。不过,十分遗憾的是,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的此次大会并没有完成这双重使命。具体而言,它并未实现哈贝马斯念兹在兹的学术研究的政治使命——以文化融合促进德意志民族的统一,让德国真正成为为一个现代民族踏上欧洲与世界的舞台。那么,这次会议的内在政治诉求为何无法得以实现呢?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由于与会的专家学者并没有能够在专业的学术研究、学科制度建设之外,真正看到文化所具备的政治及历史功用。为此,哈贝马斯提出:“语言、诗歌、法律和历史当中的人性内容非常重要。但人文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并非只在于揭示人的内在价值和尊严,而更在于承担民族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历史性功用。”

在“法兰克福日耳曼语言文学学大会”之后,我们看到,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忽略了其背后的政治理解与社会关怀,人为地将自己限定为一种专业的学术研究,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倒向了19世纪大行其道的科学主义的研究路径。具体的表现是,在德国称道于世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中,以文学、历史、哲学、政治学为核心的人文社会科学迅速完成了专业化、制度化的转型。一个科学、规范、整严的学科体系被建立起来了。但是,其社会、政治与文化的使命担当却大为失落。如此一来,人文社会科学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科学研究的方方向,一个为了实实现职业选择与学术研究目的而存在的机构。它不仅切断了与社会、政治、历史的紧密关联,同时也割裂了凝聚国家共识、塑造文化认同的精神血脉。正是由于此种内在历史使命与精神追求的缺失,德国的人文社会科学在19世纪以降,要么陷入封闭僵化的科学主义研究的旋涡,要么沦为纯粹权力话语的附庸。为此,哈贝马斯呼吁人们要充分意识到文学背后所承担的社会政治功用,高度关注洛文塔尔与阿多诺所提出的“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范式,就是突破文学内部的审美结构,将其内在的审美意涵与外在的社会政治理解、国家认同意义结合起来的综合性研究。

就中国当下而言,我们的文艺研究所遭遇的危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把文艺学变成了一门严格的科学。这种典型的科学主义学科观念,在西方已经受到深入批判,而今却在汉语世界大行其道。这其实反映了我们对于这个学科所承担的历史与社会使命缺乏应有的认识。在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文艺学的教学研究越来越专门化、科学化,层出不穷的专业术语隔绝了学科之外的广阔历史现实空间。原本在这个学科之上的“教化”使命也逐渐地被降低为一种“学科培训”的需求。第二个方面,我们的文艺研究越来越局限于文本本身,而对于文本之外的社会、政治、现实的发展变化丧失了敏感性 with 应对力。在文本的狂欢中,在术语的狂欢中,我们失去的是与时俱进的阐释能力,同时也失去了对于社会价值的引领能力。为了重树文艺批评的历史使命与价值使命,我们必须重新恢复文学的历史关联和现实关联。让它从纯粹的学科建设的目的中走出来,更好地揭示国内外社会与政治结构变迁,更鲜明地呈现广大民众的思想与意识变化,更准确地发挥文学的社会批判功能和意识形态建构功能。从而为我们构建当代中国所必须的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奠定牢靠的基础。

哈贝马斯在分析德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政治自我理解之时,提出了文学研究的政治社会功能的重建之路,即“批判的文学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里所说的“文学社会学”并非那种备受诟病的“文学的政治化”,而是一种具有强烈现代批判意识的文学社会学。虽然“文学的政治化”也强调文学的政治功能、社会功能,但是它内在的诉求在于让文学服务于政治,因而缺乏一种规范性,也缺乏一种批判性。而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是将文学视为社会话语的有机组成部分。它一方面强调社会语境对于文学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始终强调文学自身的固有规律。其内在的批判性诉求在于揭示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单纯的决定关系。就此而言,“批判的文学社会学”是一种恢复了文学以及文学批评的历史、社会、政治、现实维度的综合研究范式。

当然,将文学视为一种认同话语,走向“批判的文学社会”的研究思路,归根结底是重新倡导文学的社会与政治功能。这就需要我们采取一种开放的姿态,在不同学科内部,尤其是在文学与社会之间建立互动关系。我们当今的文艺研究,需要一种跨学科的普遍关联与跨地域的广阔视野。因此,我们所谈的作为认同话语的文艺研究,并非局限于单一民族范围的政治认同、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就像哈贝马斯在《后民族结构》中所言,在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性地位已经遭到了挑战。在目下文明格局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中,尤其是互联网时代中,美国所构建起来的一整套世界秩序,也面临着新的不确定因素。重建人文社会科学的认同功能与建构功能,就是要运用话语的力量在各种不同文化与文明之间进行博弈,夺取葛兰西意义上的文化领导权,尤其是宣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地位。就此而言,文艺研究作为一种认同话语才更加值得我们深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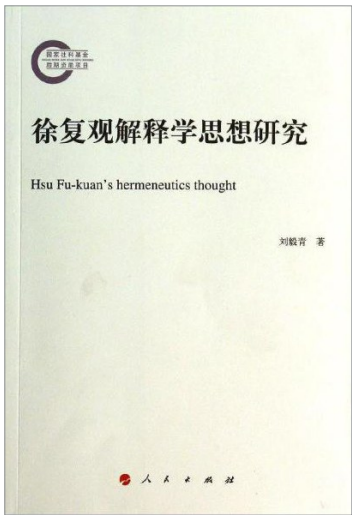
从解释学思考中国文论的重构路径

——读刘毅青《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有感

□党圣元

刘毅青的《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是第一本系统地从解释学理论角度研究徐复观美学的专著,该书拓展了新儒家的美学研究,同时也是比较美学与文论的研究重要成果。该书出版之后,在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据我所知,它已经被相关国家重大课题列为重要参考文献。

在我看来,刘毅青的《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研究》引入了一个对理解中国文论而言极为独特的问题视角,即通过解释学的意义,将中国文论的意义理论呈现出来。而正如作者在书中所强调的,中国文论与美学重建应该有一个比较的视野,也只有在一个比较的视野才能对中国文论与美学进行重构。该书的写作就是在中西比较文论与美学比较的视域中展开的。刘毅青在研究中有意摆脱当下中国诠释学、解释学研究中,那种将徐复观纳入西方解释学架构进行简单比附的做法,强调以徐复观自身的解释脉络为线索,呈现其解释学的特质。该书通过将徐复观放在中国现代学术中西碰撞的语境中,梳理其理论目标,凸现其问题意识;在与西方解释学,与传统训诂考据的双重比较中为徐复观的解释学定位。刘毅青强调徐复观不同于胡适、冯友兰,乃至其他唐君毅、牟宗三等诸学者以西释中的地方在于,他代表着一种以中释中的建构本土理论的路子。他也不再申论当代中国理论的建构,西学并不是一个合适的坐标系,但他并不是因此反对引入与研读西方学术,而是强调以中国的胃口来消化西方学术思想。比如,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反思曾经是国内学界反本质主义文论的一个核心议题,刘毅青以此为突破口,分析中



国解释学何以突破解释学循环,乃至前理解。对于这种中西的辨析作者着力颇多,主要回应的是以伽达默尔“解释学循环”为特征的西方解释学所带来的相对主义问题。作者通过意义与意味的区分来谈徐复观与伽达默尔在处理意义问题上的不同,通过对道与逻各斯的分梳,来将中西在形上学上的不同做了剖析,一切都是围绕着如何安装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来理解中国经典,以建构起解释学。刘毅青的这种比较分析着力于解释学的基本问题,尤见其理论洞察力与思维之细密。

事实上,刘毅青对徐复观解释学思想的阐发与其说出于作者的灵思,不如说来自作者对中国思想有着极为深切的体认,有着隔膜于中国学者所不具有的见微知著的功夫,而更进一步来说,中国解释学的建构从根本上就是从西方理论返回中国语境的过程。刘毅青在书中对徐复观著作作了大力气进行深耕细读,从中梳理出徐复观的解释学思想,并在与西方

解释学和当代问题的对话中做了深度的推进。刘毅青的以追体验作为构建徐复观解释学的线索,将散落在徐复观诸多面向的研究断片串连起来,构成了一个内在的理论体系,呈现出了完整的理论架构。因此,本书具有的思想穿透力得益于作者对中国古典思想的深厚造诣,能够深刻领悟徐复观的致思理路。

正如徐复观晚年归于经学研究,虽然天不假年,他未能完成其以经学打通中国现代学术的愿望,但从解释学来研究徐复观的学术思想,事实上就是以徐复观学术思想研究为线索,还原徐氏被当今文艺美学、中国诗学、思想史、哲学等学科所割裂的学术之上的理论向度,勾勒其解释学所具有的人文学普遍特点。通过徐复观对考据训诂学的局限做了分析,指出中国解释学的建构要从传统的注释之学完成解释学理论的建构就必须走出考据训诂的局限。在刘毅青看来,中国的现代解释学典范应该在现代以中国经典为核心的思想史研究中产生,徐复观的解释学是中国现代解释学的典范,代表着中国古典解释学向现代解释学迈进的尝试,对中国解释学的特质从多方面进行了阐发。刘毅青认为在当代建构中国解释学的任务,其目的就在于对传统的恰切的理解,以进行现代的表达,将古典当代化。我以為,刘毅青提出的具体价值的观点在于,他认为中国古典具有当代性的意义,并不是要以现代思想来鉴定古典那些能够成为现代资格,而在于我们应该以古典为视野来审视现代性。如果以这样的出发点来理解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那么,刘毅青的意思就是中国

文论的现代转化并不是要以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典文论,找出其中暗合西方理论体系之处,予以建构。恰恰相反,是要通过对现代理论的辩证来重新思考如何恢复古典的文论视野,以古代的传统来审视当代的中国文论的建构。这也就是刘毅青在本书中一再申论的,恢复古典原初意义。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对传统以批评为主,未能将中国文化的优秀面相呈现出来。这也影响到我们的文艺创作,中国现代以来的文艺作品里的传统精神多是负面的,没有树立传统的崇高的价值面相,这直接影响到人们对传统的接受,也使得我们不以传统作为价值之所在,也就损坏了我们建构文化的共同体。与此相关,针对现代以来以西方的那种体系与系统的理论视角来观照中国,扭曲中国,刘毅青特别主张善意的前见,书中对陈寅恪所说的“了解之同情”,钱穆念兹在兹对传统的“温情与敬意”从解释学的角度进行了阐发,指出古典的现代解释应将传统的优秀之处凸显出来,我以為这一观点有着当下的现实性。

总括来看,该书由于作者具有较好的思想史理论修养,在严格的学术规范和严密的理论洞察力中显得从容流畅,是近年来研究中国解释学有重要价值的成果,有助于新儒家美学研究的拓展,并对比较美学的研究有一定的贡献。当前的中国大众媒体兴起了一股经典解读热,但是学术界缺乏一种理论进行检讨。在我看来,《徐复观解释学研究》一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资参照的理论,以考察当代大众媒体中的经典解释的问题,为理论关注当下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切入点。